

国际青年汉学家在线会议论文

政治场域视野下 三家诗《关雎》之诗旨变迁

西华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王贞贞 副教授

目录

引言 场域与惯习

一、孔子论《关雎》与春秋末期政治场域

二、陆贾论《关雎》与汉初政治场域

三、三家《诗》论《关雎》与汉代政治场域变迁

《鲁诗》中《关雎》诗旨阐释变迁

《齐诗》中《关雎》诗旨阐释变迁

《韩诗》中《关雎》诗旨阐释变迁

引言：场域与惯习

“场域” (Field) ， 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提出的关于社会空间的一个重要隐喻，指的是由各种资源、竞争性位置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所构建的社会空间。社会由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等不同场域所组成，布迪厄认为政治场域是各类场域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在社会地位之间获得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保证了社会地位的占据者具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权力，或者一定数量的资本，从而能够进入争夺权力垄断权的斗争。斗争的核心方面则是争夺对于合法的权力形式的定义。”

场域与惯习

惯习 (Habitus) ，布迪厄称之为“定势 (disposition) 系统”，认为其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当社会行动者遭遇全新的变化和复杂的情景时，惯习能够引导行动者生发、输出新的行动来适应环境，发挥效能。在这个理论下，儒家士人说《诗》、解《诗》以实践儒家《诗》教的过程中，亦有惯习。这个惯习，就是儒家士人在进入新的政治场域时，长期性、整体性形成的立场主张、思想道德、情感价值、语言技巧等性情倾向系统，这种长期形成的、带有共同特点的性情倾向系统对于其在新的环境中，说《诗》、解《诗》行为方式会带来不同的影响。。当社会行动者遭遇全新的变化和复杂的情景时，惯习能够引导行动者生发、输出新的行动来适应环境，发挥效能。儒家士人说《诗》、解《诗》以实践儒家《诗》教的过程中，亦有惯习。这个惯习，就是儒家士人在进入新的政治场域时，长期性、整体性形成的立场主张、思想道德、情感价值、语言技巧等性情倾向系统，这种长期形成的、带有共同特点的性情倾向系统对于其在新的环境中，说《诗》、解《诗》行为方式会带来不同的影响。

以色喻于礼： 孔子论《关雎》与春秋末期政治场域

《关雎》之改……《关雎》以色喻于礼（简10）……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简14）《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

《孔子诗论》

一字之“改”，由“色”入“礼”，起到了纠正色与礼关系的作用，在诗篇的解释上引入了礼仪规范的教育，将情感的自由阐发最终引导到“发乎情而止乎礼”的道德规范上来。在孔子的观念里，其诗旨是发乎情而止乎礼。

孔子对《关雎》的解释，代表了早期儒家对《关雎》的基本看法。这种看法更多偏重于君子的个人修养，强调礼义的重要性，是早期儒家在“情”与“礼”这个经典命题中的基本主张。

以色喻于礼： 孔子论《关雎》与春秋末期政治场域

从政治场域的观点来看，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周礼所依托的尊卑分明、等差有伦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崩坏的边缘，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当时的社会环境“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礼坏乐崩的政治场域下，孔子借由《诗》的文本教育，接续和传播了西周的礼乐文化。《诗》作为礼乐文化精神的载体，承载的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经由孔子的改造和发展，诗教从乐教中分离出来，具备了独立的教化意义。一字之“改”，体现的是孔子希望恢复礼乐制度，重建人伦道德，恢复社会纲纪的良苦用心。

以义鸣其雄：

陆贾论《关雎》与汉初政治场域

《关雎》的警示、讽谏意味，在汉初陆贾所著《新语》中初现端倪：“鹿鸣以仁求其群，关雎以义鸣其雄”。此说延续了孔门《诗》教中以儒家义理解诗的传统，将《鹿鸣》之诗旨与“仁”关联，将《关雎》之诗旨与“义”关联。但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确定的《关雎》诗旨：由人情而归于礼义之阐释，在《新语》中有了新的意义扩展：首句起兴之语“关关雎鸠”，不再是整体性的起兴对象，而是分出了雌雄。关雎之雌鸟以鸣叫警示其雄鸟。鸣叫的作用是什么？是以“义”提醒雄鸟。这是在孔子诗论“以色喻于礼”基础上的进一步推演。给出了“以色喻于礼”具体的对象和路径：女子规劝男子发乎情而止乎礼。

以义鸣其雄：

陆贾论《关雎》与汉初政治场域

《淮南子·泰族篇》“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按照《淮南子》的说法，关雎这种鸟，雌鸟和雄鸟是不在一个巢穴之内生活的。从关雎这种天然习性中，儒家由此看到夫妇之伦的义理，尽管恩爱甚笃，也应节制有礼。

基于关雎天然的习性，儒家才能从关雎的叫声中，看出“义”之存在，这种夫妇之“义”，发端由“妇”，主动提醒其丈夫不可过度沉湎恩爱，而应时刻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从《新语》到《淮南子》，关雎的叫声和女子警示男子夫妇之伦遵循礼仪的逻辑关系已经完成了。由以色喻于礼，到以义鸣其雄，在西汉初期的《关雎》阐释中，意义指向上有所扩展，已经由君子的个人修身，扩展到夫妇齐家的范畴了。

以义鸣其雄：

陆贾论《关雎》与汉初政治场域

陆贾所处时代的政治场域，较之春秋中晚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秦末的焚书坑儒，令传统经典几乎断绝，儒家学说沉寂已久。新建的西汉王朝，各方力量争夺角逐，各家思想异论相搅，激烈争夺权力话语的掌控。自孔子时期儒家士人就形成的“惯习”：“内圣外王”的思想旨归和积极参与政治实践的行为准则影响着汉初的儒家知识分子积极进入新的政治场域，力图在新的环境下取得话语权力的掌控。

陆贾紧扣开国之君对前朝败亡教训的关注和治理新朝路径方法的渴求，根据西汉初期民生凋敝、百废待举的现实情况，提出仁义治国的基本原则。为了说明这个原则，《新语》中多引用儒家经典加强论证，其中多次引《诗》。对于《关雎》之诗旨，陆贾直接以“义”概括其主旨，比起孔子之“改”，更是直接向伦理教化的目标上迈出了大大的一步。西汉初期，儒学家们以《诗》为载体，积极贴近王道，努力参与政治，以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理想。

三家《诗》论《关雎》与汉代政治场域变迁

(一) 从“刺时”到“刺康王晏起”：《鲁诗》《关雎》诗旨阐释变迁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关雎》包含夫妇之大伦，关联于王道之兴衰。

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娥，而纣之灭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诗》首《关雎》，《书》美皋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

司马迁认为，人伦中最重要的夫妇之伦，关系着国家的发展。

《十二诸侯年表》中：“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

在司马迁眼中，《关雎》的创作已经具备讽谏的初衷，是周道衰微背景下的感叹警示之作。

三家《诗》论《关雎》与汉代政治场域变迁

(一) 从“刺时”到“刺康王晏起”：《鲁诗》《关雎》诗旨阐释变迁

研习鲁诗的扬雄：《法言》：“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习治也。齐桓之时缙，而《春秋》美邵陵，习乱也。故习治则伤始乱也。习乱，则好始洽也。”在《法言》中，扬雄将《关雎》的创作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周康王时期联系在一起。之后的鲁诗学派经学家们，据此再次展开了经义的完善与推演。

至少在汉武帝时期，鲁诗学派中已经将《关雎》的诗旨与“周道衰微”联系起来，《关雎》的创作动机开始具备了讽谏的意味。

家学《鲁诗》的刘向在《列女传》卷三《仁智传》中，写到了魏国的老妇人曲沃负向魏哀王进谏的故事。在劝言中，曲沃负提到了周康王晏起，而夫人为关雎所刺：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预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列女传》的书写，让君王晏起而致国运衰退的罪过，从君王本身，转移到了后宫之后妃身上。

三家《诗》论《关雎》与汉代政治场域变迁

(一) 从“刺时”到“刺康王晏起”：《鲁诗》《关雎》诗旨阐释变迁

《关雎》在鲁《诗》学派的阐释序列中，其诗旨变化的关键时期有两个，一个是司马迁时期，一个是刘向时期。这两个时期，西汉的政治场域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武帝晚年时，国家的危机已经到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程度，国家财政匮乏、百姓疲惫，社会矛盾突出，同时朝廷中儒家与法家、阴阳家等各派学说思想交锋也异常激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将《关雎》之创作，与“周道缺失”“世道衰微”这个宏观背景联系起来，为之后鲁《诗》学者将《关雎》定为“刺时”之诗埋下了伏笔。作为家学渊源的史学家，精通六经的儒家学者，据实直书的史家原则与儒家微言大义的书写方式就是司马迁所习得的“惯习”。这个“惯习”，促使他在危机重重的政治场域下，以“周道衰微”描述《关雎》创作之背景，强调“幽厉之缺，始于衽席”，将《关雎》定义为刺时之诗。

三家《诗》论《关雎》与汉代政治场域变迁

(一) 从“刺时”到“刺康王晏起”：《鲁诗》《关雎》诗旨阐释变迁

鲁诗阐释转变的另一个关键时期，是刘向时期。刘向是楚元王的玄孙。楚元王从浮丘伯习《诗》。数代习鲁《诗》的深厚家学，培养了刘向《诗》学阐释偏重讽喻的“惯习”。而刘向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由盛转衰的特殊时期，刘向本人多次卷入西汉中后期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一直到成帝时期才被重新启用。但成帝本人沉迷女色，废黜许后，盛宠赵飞燕姐妹，后宫混乱，礼制崩坏，丑闻频出。朝中外戚势力庞大，“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作为汉王朝的宗室与重臣，刘向对于汉王朝的兴衰有着比普通学者更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匡正之心，因此作《列女传》汇集历史上优秀女性的贤德之言行以为后宫效仿之法，同时也集录历史上祸国殃民之女子故事，以为后宫之警戒，借此规谏成帝正宫闱而抑外戚，维护国运不衰。鉴于当时后妃无德，外戚横行的实际情况，他直接将《关雎》的讽喻对象明确为失德之后妃。这是作为鲁诗传人、皇室宗亲的刘向之“惯习”与其当时后宫无序，外戚横行的政治场域交互作用的结果。

三家《诗》论《关雎》与汉代政治场域变迁

(二) 纲纪之首，王教之端：《齐诗》《关雎》诗旨阐释

齐诗学派匡衡奏疏中提及《关雎》，称其家法相传，《关雎》之大义在于夫妇之伦为纲纪之首，王教之端。说明《齐诗》家法相传，《关雎》是一首颂美之诗，颂美之对象为品行端庄之后夫人。

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

从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齐诗》中以《关雎》为颂美之诗，无讽喻之意。与《鲁诗》相同之处，在于都认为《关雎》中所言及的夫妇之道代表纲纪与王道，关联国家治乱兴衰。不同的是，《齐诗》认为，《关雎》所述乃品德高贵、动静合度之淑女，是值得效仿的正面例子，而《鲁诗》认为《关雎》乃讽刺后夫人无德，是应该镜鉴的反面例子。

三家《诗》论《关雎》与汉代政治场域变迁

(二) 纲纪之首，王教之端：《齐诗》《关雎》诗旨阐释

从《齐诗》形成流传的政治场域来看，《齐诗》传人皆至朝廷显贵，仕途畅达。辕固生虽在窦太后时期遭遇“入圈刺豕”之羞辱，但其个性却得到景帝欣赏，后拜为清河太守。辕固的弟子中，夏侯始昌精通经术，深得武帝信任。武帝特别选拔他为昌邑王的太傅，教授《五经》。夏侯始昌的弟子中，后苍担任过博士和少府的官职。后苍的弟子有翼奉、萧望之、匡衡等，都担任过朝廷高官，在政论意见中以《诗》论政，引诗进谏，推动了西汉晚期“诗经治国”的风潮。匡衡的弟子门人“皆至大官”，“徒众尤甚”。西汉时期三家《诗》中，一《齐诗》学派政治势力最为显赫，在朝廷中拥有较高话语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齐诗》学派数位学者如匡衡、伏理、师丹都曾为天子之师，为天子教授《诗经》。学者与天子的关系密切友好，解《诗》为“刺”缺乏基本动机。朝廷重臣的显赫地位、与天子之间信任亲密的关系，以及尚算清明的后宫环境，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令《齐诗》解读《关雎》着重于颂美之意。

三家《诗》论《关雎》与汉代政治场域变迁

(三) 从“大道之至”到“说淑女以刺时”：《韩诗》《关雎》诗旨阐释变迁

《韩诗》学派对《关雎》的诗旨阐释，随着政治场域的变化，分为了诗之创作与诗之功用两面。《韩诗内传》在宋代已经亡佚，其所流传下来的佚文中并无关于《关雎》的阐释。但在《韩诗外传》中，借孔子之口称颂《关雎》，称了解《关雎》之道之人，为“德之所藏，道之所行”，盛赞《关雎》之道至大至高，为“天地之基”“王道之原”。

《韩诗》中对于《关雎》阐释的变化发生在东汉初期。韩诗传人薛汉所作的《韩诗章句》中，开始提到了贤人以《关雎》“刺时”。《韩诗章句》区分了“诗人”与“贤人”对于《关雎》的不同作用，“诗人”之作体现了东汉之《韩诗》沿袭了《外传》对于《关雎》主旨的阐释；而“贤人”咏《关雎》以“刺时”说法的提出，体现了东汉时期《韩诗》对于政治的高度关注与顺应时事的积极调整。

三家《诗》论《关雎》与汉代政治场域变迁

(三) 从“大道之至”到“说淑女以刺时”：《韩诗》《关雎》诗旨阐释变迁

转变的原因和政治场域的影响。

一是明帝重视谏诤，鼓励臣下进谏。在这样的政治思想指导下，“《诗》可以怨”的讽谏功能在当时得到提倡。不仅在这部诏书中明帝以《关雎》刺世举例，《后汉书》中记载的明帝的多部诏书中，都反复提到《诗》的讽谏功能。

二是薛汉本人积极顺应时事作出学术调整。《韩诗》学派的薛汉能够“尤善说灾异讖纬”，可以推测其可能受到东汉初期政治氛围和君主提倡的影响而改变学术研究路径。这样一个审时度势的学者，在明帝大力提倡谏诤之风，强调《诗》的讽谏功能时，将《关雎》之用阐述成“刺时”之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是其个人顺应时事之“惯习”，与汉明帝时期推重讽谏的特殊政治场域相互作用之结果。

结语

在政治场域的视野下，以三家《诗》中对于《关雎》诗旨的阐释演变作为研究对象，更具有典型性。纵观《关雎》诗旨变化的脉络，“以色喻于礼”是由性情入礼仪，道“以义鸣其雄”，是由礼仪入道德，再到“刺康王晏起”，则是由道德而入王教了。在转入政治阐释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学派经学家个人身份、性格、际遇、学术传承，以及所处时代政治场域的不同，《关雎》诗旨向着“美”“刺”两个不同方向发展。这个过程既是经学阐释从礼仪阐释到道德阐释，再到政治阐释的过程，也是《诗经》学者所具备的儒家共性与自身个性之“惯习”与不断变化的政治场域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儒家学者赋予了《关雎》强烈的道德教化与政治意义，无论是基于“刺时”的讽喻之说，还是基于“美德”的颂美之说，将鸟禽之习性联系到夫妇之伦理，再推演到政教之大道，其后反映的都是其修齐治平的道德追求和经世济民、匡正时弊的责任担当。
